

“借君无弦琴 寓我非指弹”

——苏轼《和陶诗》新论

巩本栋

苏轼《和陶诗》是北宋熙丰、元祐党争影响下的产物。苏轼对陶诗的选择,反映了其思想上兼融儒道的主要倾向,《和陶诗》是透视作者心灵变化的一扇窗口。苏轼把“和陶”当作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和陶诗》代表了苏轼后期诗歌创作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的《和陶诗》不但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而且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进程。

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正月,时任扬州知州的苏轼,作了《和陶饮酒二十首》一组诗,开始了一个“要当尽和其诗”的特殊创作历程。三年后即哲宗绍圣二年(1095),被贬惠州的苏轼,再作《和陶贫士七首》。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元符三年(1100),谪居琼州昌化军的苏轼,作《和陶始经曲阿》,前后作“和陶”诗达137首,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苏轼为何要“尽和”陶诗?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文学现象?目前学术界仍未有一个完满的答案^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唱和诗词研究”(批准号:04BZW035)阶段性成果

一、苏轼“和陶”与北宋党争

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政,随着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的去世(王安石亦于次年辞世),大致已结束。宋哲宗即位时年仅十岁,宣仁高后垂帘听政,起用吕公著、司马光等旧臣,完全不顾新法实施的效果如何,执意将青苗、免役、方田、市易等新法措施一概罢去,并设置诉理所,重新审理熙、丰年间的各类案件。因反新法而遭贬抑者,多予以昭雪,重新启用。新党中人如章惇、蔡确、吕惠卿等,则在刘摯、孙觉、朱光庭等人的反复弹劾下,先后被逐出朝廷。整个元祐年间,北宋政局始终控制在旧党人士的手中。然而,在政治上被列入旧党的苏轼,似乎与旧党中的一些士人并未步调一致。其实,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其党派内部的结构原就比较松散,并且二者之间也有相激相争的因素。因此,一旦某一派败下阵去,另一派也必

然会发生分化。元祐间,以苏轼和程颐为首的旧党部分士人之间即发生所谓“洛蜀党争”。

“洛蜀党争”始末并不复杂。元祐元年(1086)三月,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下,程颐被用为崇政殿说书。但随即就有刘摯上书反对,认为升迁太快,并说他是“高阔以慕古,新奇以变常”^②。当时,苏轼、吕陶等也都认为程颐言行迂阔,不合人情^③,甚至连司马光也觉得程颐在经筵上的言行不切实际^④。元祐二年八月,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之经筵讲说:“凡经义所在,全无发明,必因藉一事,泛滥援引。”又云:“日跨匹马,奔驰权利,遍谒贵臣,历造台谏……鼓腾利口,间谍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纷纷扰扰,无有定日。”^⑤于是,程颐被罢经筵,改官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素推服程颐学问的台谏官朱光庭、王岩叟、贾易等人,则抓住苏轼的《试馆阁策问》(“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一篇)大做文章,认为是讥刺仁宗、神宗,“不忠莫大焉”^⑥。苏轼、吕陶等亦上书论辩。太皇太后高氏虽两相开释,然洛蜀之争所带来的矛盾和隔阂,已难弭平。洛蜀之争的实质,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掺杂着复杂的人事、意气成分。关于这一斗争的是非得失,姑不赘言,然而它对苏轼生活和心态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这当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乌台诗案”说起。此年七月,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而被罢官,并被捕下狱。嗣后在慈圣光献曹后及王安礼、吴充、章惇等多人的解救下,方幸免于难,被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黄州贬所谪居四年,苏轼有诗云:“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⑦他悲叹:“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⑧有时竟至于“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⑨。此时的苏轼,真可谓惶恐不安,胆战心惊,其忧谗畏讥、隐忍怨艾的心态可以想见。

宋神宗去世后,虽政局变化,旧党执政,苏轼也迅速地由朝奉郎、知登州,而改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改赐银绯,然自元祐元年七月,因与司马光在是否恢复差役等新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苏轼就已动了外任的念头。次年因试馆职策问事,四次进札子求补外不许,后又因讲筵事多次遭到指责。到了元祐四年,苏轼才终于获允离京出知杭州。他之所以屡屡乞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元丰间乌台诗案的前车之鉴给苏轼留下的心灵创伤太深了。他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新旧党争的风波并未平息,他不愿意再卷入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早日离开是非之地,或许是他当时的最佳选择。元祐六年五月,苏轼屡辞不获,再次被诏回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侍御史贾易果然又重翻旧账,攻击苏轼元丰八年在扬州作诗意存不善。苏轼在极力辩解的同时,又重新请求外任,八月即出知颍州,在京仅三月。次年正月,改知扬州,旋被诏回京,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直到元祐八年六月出知定州。

从上述不遑安居的仕履来看,苏轼在整个元祐年间似乎始终处在一种忧心忡忡的状态之中。他希望政局能稳定下来,然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斗仍明显存在,洛蜀两党的矛盾更难以消除,他希望能离开京城这个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既使他离开了京城也仍旧不能完全摆脱新旧党争的影响。进退两难,犹豫徬徨,无所适从,矛盾复杂的心情常常萦绕在苏轼的心头。非醉非醒,“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⑩;“伤弓之鸟,固已惊飞,漏网之鱼,难于再饵”^⑪,道出了苏轼这一时期的心迹。苏轼能否从当日的政治漩涡中摆脱出来呢?以苏轼“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的性格^⑫,他很难做到遇事隐忍不发。他能否从此引退,归隐田园呢?也难做到,这与陶渊明相比,堪称自愧弗如。绍圣元年(1094)正月,苏轼书陶渊明《归园田居六首》其三,并与李之仪等相与叹息,谓“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⑬,又说“我比陶令愧”^⑭,确系实情。苏轼在政治生活中一时尚不能实现的愿望,只能在其诗歌创作中进行弥补。陶渊明其人其诗给苏轼提供了这种弥补的机会。“和陶”

于是成了苏轼摆脱和逃避党争政治现实并在心理上自宽自慰的重要途径。

二、苏轼与陶渊明的思想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 陈寅恪曾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 故非名教说 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 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 或别学神仙 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 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 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 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 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⑮关于苏轼的思想 一般都认为是杂糅儒释道三家 而以儒家思想为主。然考察现存苏轼的全部著述 却会发现 这种说法实失之于泛。笔者以为 苏轼思想中虽杂有儒释道三家的因素 但实际上释氏之说在其思想中所占的地位既不能与儒、道两家相比 更不用说其在政治上的排斥释氏了^⑯。

秦观尝有论苏轼之语曰：“苏轼之道 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⑰所谓“性命自得” 即兼融儒道 是其“性命论”和“人情论”的统一。中唐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 士人喜谈道德性命之理 黄庭坚即有所谓“今孺子总发而服大人之冠 执经谈性命 犹河汉而无极也”^⑱ 以至“学者耻不言性命”^⑲。然苏轼对前人关于性、命、情的论述 似乎都不满意 他在《易传》中提出 在“性、命、情”三者之中 “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 同时 “性”之与“情、命”又合而为一 在三者之间 并无等差 亦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禀赋而言 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 故可以称为“命” 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 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 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 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 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 似乎与道家之说最近 但又讲“有为” 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 则与儒家之说仍相联系。总之 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 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苏轼儒道融合的思想 还表现在其《中庸论》中。此文“始论诚明之所入 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 推而至于其所终极 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⑳。所讨论的中心就是要顺乎人之情性 无过无不及 由“明”而至于“诚” “人情”在苏轼那里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儒家原有礼本之人情的观点 如汉初叔孙通制礼 就明说“礼者 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也”^㉑。然而 将“人情”或情性说推行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至奉为人处世的准则 认为“夫人之情 安于其所常为 无故而变其俗 则其势必不从”^㉒ 认为“六经之道 惟其近于人情 是以久传而不废”等等^㉓ 却不能不说是苏洵、苏轼父子自己的特色。苏辙尝谓：“（轼）初好贾谊、陆贽之书 论古今之乱 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 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 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 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 其言微妙 皆古人所未喻。”^㉔可谓能知其兄。释氏思想对苏轼并非没有影响。苏轼文章中亦多处谈到 如说：“孔老异门 儒释分宫。又于其间 禅律相攻。我见大海 有北南东。江河虽殊 其至则同。”^㉕表现出调和三家的倾向。但是 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和方面来看 以儒道兼融而本之于情性论来概括之 也许更接近苏轼思想学术的实际。

由此看来 苏轼的“和陶” 与他在思想上对陶渊明的认同密切相关。陶渊明凭着其糅合儒道的新自然说出处进退 一任自由 即所谓：“渊明初亦仕 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 视世羞独

贤。”^②苏轼也以儒道并用来解释自己的仕隐之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③陶渊明在诗中不断地宣扬着顺应自然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④“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⑤苏轼则心领神会：“拈出陶渊明谈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⑥当苏轼在仕途上进退维谷、前后失据，极欲摆脱心理压力、弥补思想情感的空虚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之时，终于在儒道兼融、以道为用的道路上与陶渊明走到一起来了。这正如苏轼自道：“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⑦黄庭坚所云：“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⑧

三、《和陶诗》透视苏轼心灵的窗口

陶渊明的诗在南朝时并没有多少人特别欣赏它。自唐代起，慕陶学陶者渐多。明标“学陶”的就有崔颢的《结定襄狱效陶》、韦应物的《效陶二首》、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和曹邴的《山中效陶》等等。但是，次韵“和陶”诗且颇寓己意的，则始见于晚唐诗人唐彦谦的《和陶贫士七首》，而不是始自苏轼。苏轼只是要当“尽和”陶诗的第一位而已。“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⑨，苏轼之“和陶”，实际上是把它当作疗救自己心灵创伤的良方，把“和陶”作为排遣、减轻自己仕隐、穷达等人生痛苦的途径，把“和陶”看成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故凡有所感触，提笔便想到陶诗。这就是东坡“要当尽和其诗乃已”的苦心所在^⑩。这决定了苏轼《和陶诗》的内容，首先是慕陶学陶。苏轼曾自道：“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⑪苏轼此语，亦可谓实录也。

苏轼最早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云：“我生不如陶，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⑫写这一组诗时，苏轼尚处于“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的状态中，所以只求心安，不论形迹。再看本组诗其三：“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⑬陶渊明原诗不过讲及时行乐、人生适意的道理，此诗则对陶氏的不求名利，大加赞赏，其慕陶学陶的心态显而易见。待到苏轼由惠州而儋州，一贬再贬，想学陶归隐而不可得之后，那更是时时想到陶渊明，时时与陶相比，时时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生活楷模。他吟诵道：“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困来卧重裯，忧愧自不眠。我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⑭安贫乐道，心止如水，似乎已完全把出处进退看透了。

由慕陶、学陶而似陶，并非容易。苏轼的《和陶诗》，在很多情形下，还是借酒浇愁，领悟并运用老庄委时任运、顺应自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以暂时走出其心理困境。有关作品诸如：“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尔我所然。”^⑮“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⑯“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⑰反复嗟叹，难以备举。诚如清人陆荃所云，苏轼“和陶”诗乃“此老晚年进境……多见道之言。”^⑱有时，苏轼直欲窒目塞听，自我麻醉：“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⑲今日读之，仍不免令人悲从中来。这些“见道之言”，本身或无多可取，但作为透视苏轼后期心灵窗口的《和陶诗》，还是能令我们看到苏轼这位正直而务实的士大夫的诸多不幸。他始陷大狱，贬黄州，后则“团团如磨牛”，“二年阅三州”^⑳，再则贬

筠州、定州，未则迁惠州、儋州，堪称横遭打击备受磨难，这位“早读《范滂传》”，志欲有用于天下的才子，只能“晚和渊明诗”^⑤，愈益求助于老庄的自然虚无之论，追求不醉不醒之境界。总之，这些“和陶”之作客观上反映了北宋后期严酷的党争现实，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正如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⑥一样，苏轼也并未真的遗世独立了。他年已迟暮，依然期望有朝一日能再回朝发挥余热：“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生在，未免病药俱。”^⑦待到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又作《和陶始经曲阿》，欣喜畅言：“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我生值良时，朱金义当纡。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⑧可见，苏轼虽苦苦追求着不醒不醉的境界，但其积极用世之心始终没有完全泯灭。惟其如此，诗人在南迁之后，依旧关注着当日的政治现实，关心着国计民生。比如《和陶咏二疏》，苏轼借汉代疏广、疏受兄弟退隐不仕的事，讥刺朝中胁肩谄笑、多方图进的好利之徒，表现了自己不肯与龌龊小人为伍的高尚情操：“世途方轂击，谁肯行此路。”^⑨又如《和陶拟古九首》其六云：“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自注谓：“朱初平、刘谊欲冠带黎人，以取水沉耳。”^⑩这虽与李焘的记载不合，但从诗人前此所写的《荔枝叹》来看，显然具有现实意义。至于在《和陶劝农六首》其一、其中二，把黎民“怨愤劫质，寻弋相因”的根源^⑪，归之于“贪夫污吏，鹰挚狼食”^⑫，尤其难能可贵。想象着“鸩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的苏轼^⑬，在惠、儋期间与黎民颇多往来。无论其思想感情还是日常生活，都与百姓大为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劝黎民：“利尔粗粝，好尔邻偶。斩艾蓬翟，南东其亩。父兄搢挺，从扶游手。”^⑭鼓励他们：“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祝愿他们：“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⑮甚至在“醉语忽谈天”之时，也想到“清风洗徂暑，连雨催丰年”^⑯，可见苏轼从来没有忘记百姓疾苦。

元好问评陶渊明的诗，说它“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⑰，可谓知言。苏轼“师渊明之雅致，和百篇之新诗”^⑱，的确写了不少真淳自然、古淡而又清新的好诗，代表了其晚年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和陶拟古九首》其一：“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⑲客人来访，叩门不应，却原来主人正头枕书册，做着与友人诗酒相会的好梦，待到梦中惊醒的主人“倒裳”迎客的时候，一时间竟感到既对不起来客，又辜负了刚被惊散的梦中友人。这就把主人一片真淳厚朴之心，和盘托给了读者。陶渊明原唱写诗人久出而归见兰枯柳衰的愧负之情，此则写闭门谢客、自然超脱的恬淡心境，诚如洪迈所云：“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⑳再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长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㉑用小舟夜中发，天明度千山的比喻，来说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表现出委运任化的老庄思想。其比喻手法的巧妙娴熟、语言的朴实纯净、风格的清淡自然，给人以极大的美感。尤其是描绘诗人醉卧小舟，朦胧中万重山峦夕发朝过，真一幅情趣盎然的夜航图。

苏轼的《和陶诗》中还有许多从平淡自然中不时流露出森然锋芒或者萧散疏远中显出奇崛、沉郁的作品。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二、其八、其十二，《和陶乞食》、《和陶拟古九首》其四等。这实际也不奇怪，渊明本就不是浑身静穆的，而如上文所论，苏轼南迁，“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㉒。清人王文诰曾谓：“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山海经》、《拟古杂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古纪游诸事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者，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又有非和陶而意

有得于陶者,如《迁居》、《所居》之类皆是。其《观棋》一诗,则驾陶而上之,陶无此脱净之文,亦不能一笔单行到底也……子由作叙,以陶为拙,公删去之,盖其意既以陶自托,又岂肯与之较事功论优劣哉?”^⑤指出苏轼“和陶”乃以陶自托,故有多种面目,而不必斤斤于原作与和作的似或不似。不过,笔者仍须指出的是,苏轼之“和陶”,决非为“和陶”而“和陶”,而是把“和陶”作为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或因事而发,或触景生情,皆从生活中有所感发而自然联想到陶渊明其人其诗。比如他以酒浇愁,非醉非醒,借以排遣心中之郁闷,便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春日游山,浴乎汤泉,陶然而归,适闻其子诵陶诗,又会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迁惠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迒,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七篇”^⑥,而闲居无事,读书有感,则又会联想到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用其韵而和之。总之,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氏原作,无论似与不似,都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契合。

自元丰初年谪居黄州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波折和生活中的变化,苏轼开始对陶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读陶诗、校陶集^⑦,进而“评陶”、“和陶”。陶诗与苏轼结成了不解之缘。“和陶”与“评陶”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和陶”的过程中,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论却明显地多起来,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到的诗歌评论意见。从这些评论中,我们不难见出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不难看出生活在诗人心灵上留下的印痕。比如他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望)南山”中异文的判断,就是在出知扬州开始“和陶”后作的。十数年后,其门下士晁补之回忆道:

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心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⑧

东篱采菊,举首见山,意与境会,一切都在不经意之中。从诗意上看,这似乎比有意识地“望南山”,更真淳自然些。再如,他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高度评价^⑨,则是在绍圣四年(1097)渡海之后所作的。作为诗人的苏轼的这些评论,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大约也是在知扬州前后,苏轼还曾录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九,并作有跋语:

“清晨闻扣门,倒裳自往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诿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⑩

陶渊明原诗主要是表达自己归隐田园的志节,而苏轼则着眼于其出语的真率、无所拘束。这种议论和接受当然又与他自身的遭际大有关系了。

苏轼的和陶以及在和陶过程中不断深化着的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也影响到他南迁后的诗歌创作。观上文所举《和陶拟古九首》其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二等,皆是其例,此不必赘述。另外,他的《雨后行菜圃》、《残腊独出二首》、《午窗坐睡》、《迁居》、《十二月十七日夜坐达晓寄子由》、《观棋》、《独觉》等作品,也力图用老庄委运任化之说,将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与是非曲直的争竞以及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一笔抹去,

诗也就显得真淳素朴、平静自然，而往日诗歌中清奇、旷放、雄健的风格因素，在这些作品中似也都不甚明显了。

四、结语

陶渊明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大致在南朝已经确立，那就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①。颜延之谓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②沈约撰《宋书》，将其置于《隐逸传》，“隐逸诗人之宗”，成了影响后世最大的一种看法。对于陶渊明仕而复隐的原因，南朝士人也作过解释。如沈约就曾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③他认为陶渊明退隐的原因在于恪守政治气节。萧统则说：“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伎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得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④他从传统儒家士人的品德修养立论，而又杂以老庄之说，对陶渊明归隐的思想根源，进行了申说。后人论说也大致持沈约或萧统之说，如唐颜真卿就赞叹陶渊明有气节：“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⑤北宋梅尧臣也慨叹：“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⑥都可谓承沈约之说。而如唐人吴筠咏陶：“吾重陶渊明，达生知知足。”^⑦宋人曾巩过彭泽县云：“渊明昔抱道，为贫仕兹邑。幡然复谢去，肯受一官縶？”^⑧两人又近乎萧统之论。

在对待陶渊明出处进退的问题上，北宋又出现了一种似乎更为通达的看法。如刘攽《题孙昌龄归来亭》诗云：“古云陶渊明，避俗非达道。”^⑨韩维则说：“寸禄折腰何必去，道存心在即渊明。”^⑩这些看法，在刘攽和韩维，或偶一论之，而在苏轼那里，则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解和认识，即苏轼和陶，本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陶渊明所以能出处进退，一任自然，除了有其思想上儒道结合的根源之外，也有性情上的因素。陶渊明曾自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⑪即可见之。苏轼在思想上杂糅儒道，而中心则是其情性论，其“评陶”云：“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⑫苏轼又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⑬对陶渊明的理解和接受，从南朝士人以不肯“屈身后代”的气节和“抱道”、“知足”的志向论陶，到苏轼的以超越出处进退之迹、以情性之真论陶，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小序有云：“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苏轼认为此语不仅能得酒中之趣，而且尤得自然之趣。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七“秋菊有佳色”一句，苏轼评云：“以无事自适。”^⑭诸如此类的评论，无不是观照陶渊明情性所得。陈寅恪对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曾有一个评价：“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⑮苏轼之“和陶”以及在“和陶”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陶渊明思想上兼融儒道、精神上追求适意自然的理解和认同，实际上既是对陶渊明诗歌史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其思想文化地位的认定，个中所反映的，正是宋学讲求义理、杂糅儒道或释教的思想方法和时代特征。今天讨论苏轼“和陶”问题，就不能仅仅以诗歌唱和现象视之。

① 此前学界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多是从隐逸心态和文学接受角度进行的。如张宏生曾指出苏轼“和陶”在陶诗范式的确立过程中，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参见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第二章《陶诗范式与和陶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 ②③⑤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三九〇第9494页,卷三九三第9569页,卷四〇四第9829—9830页,卷三九三第9569页。
- ④ 马永卿编《元城语录》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63册第361页。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王文诰注《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95页,第1113页,第1108页,第1881页,第1716页,第2138页,第2198页,第2267页,第2104页,第1883页,第1884页,第2271—2272页,第2104页,第2246页,第2307页,第1888页,第1899页,第2282页,第2356页,第2183页,第2264页,第2255页,第2256页,第2281页,第2256页,第2257页,第2253页,第2561页,第2260—2261页,第1885页,第2107页,第2136页,第2138页。
- ⑪ 莫君陈《月河所闻录》引苏轼《辞内翰表》,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吴兴丛书》1994年版,第95册第597页。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3页,第2112页,第725页,第60页,第55页,第1961页,第1626页,第2111页,第2112页,第2091页。
- ⑮⑯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8—229页,第229页。
- ⑯ 如元祐四年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曾连上三状激烈反对高丽僧义天来华祭奠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其原因除了出于维护宋朝国家利益的考虑之外,当有政治上排佛的原因。
- ⑰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〇《答傅彬老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中册第981页。
- ⑱⑳ 黄庭坚《山谷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六《杨概字序》,卷七《跋子瞻和陶诗》,第1113册第141页,第57页。
- ㉑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22页。
- ㉒ 苏洵撰、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卷六《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 ㉔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下册第1421—1422页。
- ㉖㉗㉘㉙ 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引苏轼语,施元之、顾禧、施宿注《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卷四一,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版。费衎《梁溪漫志》卷四亦谓此语是苏轼所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 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二《形影神·神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页,第89页,第9页,第40页。
- ③⑩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507页。
- ④② 陆莹《问花楼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2306页。
- ④⑤ 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一五引杜濬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上册第405页。
- ④⑥ 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 ⑤⑦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郭绍虞集解笺释《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 ⑥⑩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三“东坡和陶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47页。
- ⑥⑤ 元丰七年苏轼在黄州时,欲求陶集,适有江州太守李某以陶集一部相赠,苏轼喜甚。自此更多以陶集相随,并谓:“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苏轼文集》卷六七《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第2091页)至元祐年间,便以其校阅过的《陶渊明集》,送给了赵令畴(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惜其所校之本今已难觅。
- ⑥⑥ 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三《题陶渊明诗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第644页。苏轼《志林》中亦有《题渊明饮酒诗后》一篇(《苏轼文集》卷六七已收入,第2092页),内容与此大致相同。
- ⑥⑨ 钟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 ⑦⑩ 颜延之《陶徵士诔》,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0页。
- ⑦① 《宋书·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8—2289页。
- ⑦③ 颜真卿《颜鲁公集》卷一六《陶公栗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1册第696页。
- ⑦④ 梅尧臣《送永叔归乾德》,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42页。
- ⑦⑤ 吴筠《宗玄集》卷下《高士咏·陶徵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71册第756页。
- ⑦⑥ 曾巩《曾巩集》卷三《过彭泽》,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 ⑦⑦ 刘攽《彭城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6册第52页。
- ⑦⑧ 韩维《南阳集》卷一〇《送辛十七作尉盐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第601页。
- ⑧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并谓:“余尝三复斯言,可谓至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